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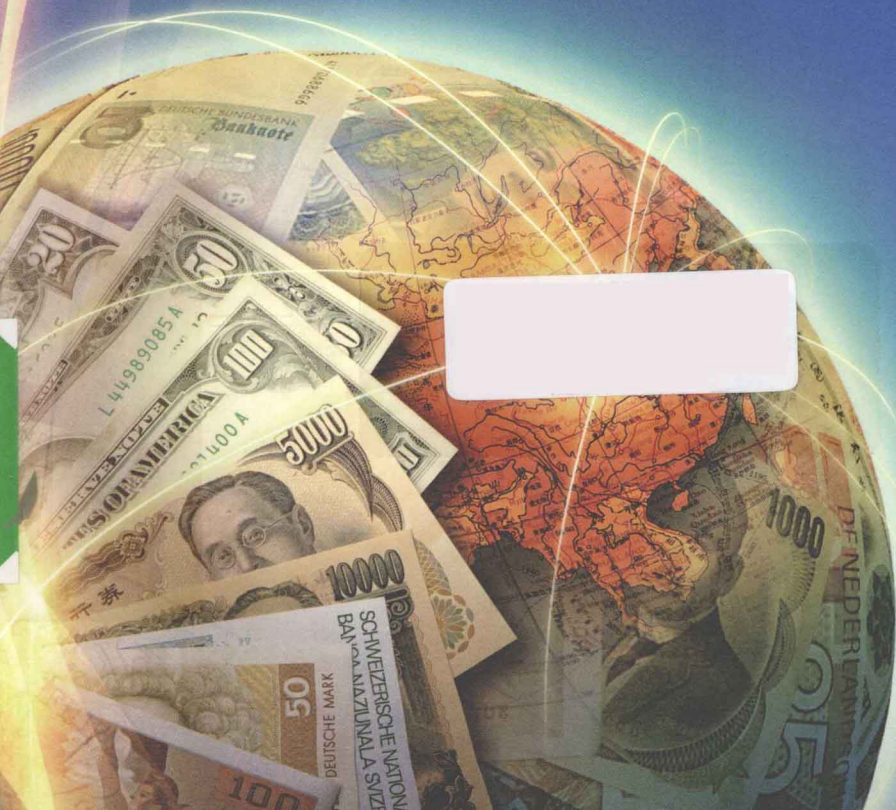
开放中的战略互动

—— 外贸、外资与金融发展的政策协同

赵蓓文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智库报告

New 新开放论丛
Opening Up

张幼文 徐明棋 主编

开放中的战略互动

—— 外贸、外资与金融发展的政策协同

赵蓓文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中的战略互动:外贸、外资与金融发展的政策
协同/赵蓓文等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新开放论丛/张幼文,徐明棋主编)

ISBN 978-7-5520-0411-3

I. ①开… II. ①赵… III. ①经济开放-研究-中国
IV. ①F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23242 号

开放中的战略互动

——外贸、外资与金融发展的政策协同

主 编:张幼文 徐明棋

著 者:赵蓓文等

责任编辑:沈 洁

封面设计:陆红强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照 排: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32

插 页:2

字 数:520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411-3/F·199

定价: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作者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重大问题研究”(09AZD001)最终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完成,该项目在结项评审鉴定中获得良好成绩。本书为大量集体讨论形成的成果,所有课题组成员均深入讨论,相互启发,为集体成果作出了贡献。具体分工如下:

课题负责人:赵蓓文

导 论:赵蓓文

第一章:赵蓓文

第二章:赵蓓文

第三章:吴雪明

第四章:吴雪明

第五章:赵蓓文(第一节),于蕾、沈桂龙(第二节、第三节)

第六章:赵蓓文

第七章:于蕾、沈桂龙(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之一、二),赵蓓文(第三节之三)

第八章:崔大沪、唐杰英

第九章:赵蓓文(第一节、第五节),赵蓓文、于蕾、沈桂龙(第二节、第三节),孙立行(第四节)

第十章:唐杰英

第十一章:孙立行(第一节,第二节之三部分内容),杨明秋(第二节、第三节)

第十二章:孙立行(第一节、第三节),杨雪峰(第二节)

第十三章:高洪民

结 语:赵蓓文

赵蓓文负责全书的统稿、删减、补充、调整和最终定稿。严撼、宋方钊对部分章节的数据进行收集、计算和整理。

总 序

当下的中国,正全面寻求以创新驱动发展。在全面的创新中,开放的创新无疑具有广泛而深刻的意义。开放的创新是国家整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需要,是对外开放战略面向新目标的需要,是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新挑战的需要。中国需要培育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构建国际合作的新平台,开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新空间,即打造对外开放的“升级版”。这就是所谓的“新开放”。

在未来5—10年中,需要推进新开放,其核心是构建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迎挑战的内外联动机制,构建东南部创体制、中西部上层次的东西并进格局。

一、以完成 BIT 谈判和参加 TPP 合作为动力构建 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制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一个新动向: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成为重要现象。这一趋势将大大提高对各国开放与市场准入的要求,并因其在内容上更多涉及各国国内体制和政府职能而成为对改革的压力。对中国来说,特别相关的则是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TPP)。有效应对这两个谈判将构建以开放促改革的内外联动机制。

在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发展态势中,国际投资自由化与国际贸易自由化并行发展、相互促进,在WTO多哈回合受阻、多边贸易体制受挫的情况下,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与自由贸易区谈判成为各国推进国家间经贸与投资合作的重要选择。

对中国而言,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具有推进开放与改革的双重意义。就对外开放而言,这将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拓展对外投资的空间。现代服务业扩大开放利用外资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需要,也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要求。这一领域扩大开放也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实现相互开放、互利共赢的机遇,中国有条件要求美国等发达国家对我平等互利,公平对待我对外投资扩大,并尽早承认我市场经济地位。

就国内改革而言,推进BIT谈判有利于推动国内改革。经济制度应与经济发

展阶段相适应,但是诸如目前普遍存在的审批制以及政府职能上的多方面问题,已经远不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内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制度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而以 BIT 和 TPP 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新要求正与国内改革需要相一致。完成中美 BIT 谈判能够有效地倒逼机制、推进改革。

中国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在开放中赢得竞争。在大部分主题上双边投资协定和区域一体化与我国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在充分利用以开放促改革的同时,只要我们坚持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就能够在开放型的竞争中赢得主动。我国的市场经济有其特殊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点必须坚持。市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也要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作用,要正确看待市场与政府的作用,区分政府主导和政府干预之间的差异。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美双边谈判中,我们要坚持原则,并要求美方承认我国经济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二、以探索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 平台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改革开放推动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再次提出了“以开放促改革”的课题。沿海地区的开放不仅有着对外开放转型升级的意义,而且承担着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改革、探索、试验的责任。

在新的阶段上,开放升级的内涵包括开放型经济的体制建设。开放战略升级的本质是从政策性开放上升到体制性开放。1979 年搞经济特区是政策性开放起步的标志,政策的特殊性是特区的核心。在这以后沿海地区的发展中,各种意义上的特殊政策成为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基本特色。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在前 30 多年对外开放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也对旧体制的瓦解具有重大意义。但是,随着整个经济走上开放道路,政策差异日益缩小,继续以特殊政策推进开放作用有限,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对民营资本不利,地方政府间的政策竞争降低了开放的整体效益。特别是特殊政策存在着较大的不规范性、不透明性、不确定性,不

符合国际规则与市场准入的要求。提高开放水平对政府职能与政策规范透明的制度安排的要求日益明显。与此同时,金融货币市场与服务业的低开放度都制约了完整意义上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因此,要把体制性开放作为实施新开放的基本要求。所谓体制性开放,就是按照国际规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政府管理体制。既要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发挥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导向作用,发挥多种经济成分在经济运行中的互补作用,又要把建设高效、透明、服务型政府放在首位,充分发挥开放型市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商品和资本在跨境流动中的各种障碍,从体制机制上确保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正是从体制性开放的意义上,可以更深刻地表明沿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目的在于体制探索。沿海地区自贸区建设是新开放的标志,是对外开放的升级版,是整个国家从政策性开放走上体制性开放的试验田。要从开放型经济体制建设上明确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定位,以使自由贸易区试验真正产生全局性的意义。为此,对自由贸易区应明确以下要求:

第一,体制机制的可复制性。要明确自由贸易区是体制机制探索的试验田,而不是特殊政策的飞地。因此,更优惠的税收、关税、政府补贴或土地价格不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因为全局性的政府减少收入不具有可行性。可复制性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的各项制度安排具有逐步推广的意义和可能。因此,自由贸易区的重点要放在国家未完成的各项改革的探索上,以发现新的改革的可行方案。自由贸易区的思路在于“以开放促改革”。一方面通过更高水平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发现各项改革的必要性,构造改革的动力,减少改革可能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发现改革的方向与重点,通过参照国际规范与惯例形成各项改革的有效举措。通过试验到复制推进全国改革是新开放的顶层设计,因而“可复制性”必然是对自由贸易区的第一要求。

第二,自由贸易区的功能是对尚未开放的领域和尚未完成的改革进行试验。从外资外贸的规模上讲,中国的开放度已经不低,但是从产业上讲,中国尚有一批领域没有开放。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开放,特别是金融与现代服务业,而这些又正是中国形成完整的市场运行体系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方向。要通过自由贸易区对这些领域进行先行先试的开放检验的方式,发现外部冲击,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在金

融领域,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国家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必要组成部分。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操作性试验发现其中的难点与问题,为国家全面推进这些市场化重大举措提供依据。因此,新开放也是更高水平的市场化与更深度的改革。

第三,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深化改革的一大主题,新开放就在于利用国际规范与外部动力推进这一改革。变审批制为备案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更高效的监管体系与服务体系,是市场开放国民待遇和透明度的要求,也正是我国政府职能改革的要求。根据国际投资制度安排新趋势,随着国际社会的进步和对跨国公司约束要求的增强,东道国政府要防止跨国公司环境倾销,损害劳动者权益等;要监督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关注公共利益,有效推动相关产业进步和人才成长,在开放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新开放就在于探索各级政府如何在坚持开放中有效形成这些职能,提高开放水平。

由此可见,科学推进自由贸易区试验,有利于建设开放型的经济体系。由于自由贸易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境内关外保税区,不是封闭的,而是试验性的,因而运行模式在一定时期内相对隔离,而在有效掌控下逐步扩散将是其重要特征。科学有效地把握自由贸易区对相邻地区的带动作用,及时发挥自由贸易区体制的模式传递作用,应作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指导方针。从试验到推广既是国际社会的期待,也是我国自身改革的需要。

以沿海自由贸易区为抓手推进新开放,将带来整个沿海地区开放的升级和改革的深化,为全国改革开放创造新局面。

三、以形成沿海、内陆、沿边各具特色, 联动发展为目标,创造全面开放新格局

在 30 多年后的今天,当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面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展目标迈进阶段到来之时,我们又必须看到国家各地区之间发展的巨大差距。

在实现沿海、内陆与沿边均衡发展的国家战略上,对外开放战略的总体部署应当考虑以下原则:

第一,开放是基本国策,但各地区的开放却不能采用同一模式。内陆和沿边地

区都不能简单重复东部开放的道路。中国开放的基本经验和东部模式的核心是以政策激励促进外资流入以及出口导向型模式,这不当直接作为内陆或沿边地区的模板。国家整体致力于地区间均衡发展之时,也正是中国沿海出口高速增长面临调整转型之际。与沿海当年的出口导向型相比,内陆地区要实现内需主导型战略,以巨大的内需潜力拉动发展,而这正是引进外资新的动力。在国家整体上已经取得贸易巨额顺差的发展条件下,内陆地区获得了以进口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的新的机遇,即以进口关键装备、零部件实现自主投资与创新条件下的产业发展,从而形成与东部出口导向完全不同的进口促进发展模式。与此不同,沿边地区则既不可能是外资拉动型的,也不可能是出口导向或进口推动型的,而应当以与相邻国家的双边或诸边合作为特点,其具体模式因地制宜。

第二,国家对外开放的整体水平要提升,目标要升级,由此决定了各地区开放战略的目标定位。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对中国发展提出了挑战,中国对外开放必须实现战略升级才能有效应对,其中沿海、内陆和沿边地区以及各战略经济区域都需要实现升级,才能形成各地区协同升级,各战略经济区差异化发展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目标既取决于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又要从地区特点和发展阶段出发确定相应目标。沿海、内陆和沿边各地区都要从各自的发展阶段出发确定不同的开放目标。现代服务业实现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是沿海地区未来开放的主题,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面向外部市场也仍然是沿海地区的特点。内陆地区幅员辽阔,差别巨大,以成渝地区为代表的工业化高速发展地区有条件在现代制造业上实现全面进步,需要围绕现代制造业实现开放式发展,并形成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中国在新兴产业上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内陆其他地区则更多需要致力于资源产业和农业的现代化。沿边地区有的要开辟资源与能源通道,有的要以双边诸边经济合作推进稳定周边环境的建设,从而启动各具特色的发展。

第三,各地区开放格局要形成一个新的协同与互动关系。国家发展是一个大局,各地战略与开放模式上需要形成协同与互动关系。前30年开放中内陆地区劳动力流向沿海曾经是沿海地区形成廉价劳动力加工出口优势的重要原因,也提高了内陆地区劳动者的收入,推动了脱贫事业。随着劳动力结构与数量的变化以及内陆发展机遇的扩大,这种协同与互动关系已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沿海出口加工型产业特别是轻型低运输成本类产品向内陆转移既可以为内陆地区开放创造条

件,又可以为沿海地区腾出空间实现结构进步。沿海地区现代服务业既要走开放型发展模式,又应当充分利用内陆巨大市场,形成沿海服务与内陆制造的协同发展,相互支撑。在沿海提升开放水平的同时,内陆体现开放型竞争的实力。沿海和内陆地区又能为沿边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强大的经济技术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供给,产业配套和人才流动等各个方面增强沿边对外合作的水平。从总体上讲,优化国家的区域开放格局要形成三个战略的协同:一是深化改革,使沿海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二是扩大内需,将外资引向内陆地区;三是创新模式,以多样化构建沿边对外合作。

第四,衡量开放推进的指标需要历史性地改进。在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中,沿海地区以外资外贸规模作为开放度指标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今天国家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国家发展新阶段上的主要任务也不同,内陆地区应探索以新的指标来鉴定开放水平。在新阶段上,沿海地区开放要以现代服务业外资引进为重点,同时关注现代制造业外资对中国经济贡献方面的各种国民经济效益指标。沿海中心城市还要关注离岸贸易、离岸金融的发展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等的实施进程,以此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在沿海地区建立跨国公司总部,推进中国走出去进程和主动构建国际分工能力,获得中国高级稀缺要素,应成为沿海大城市的战略重点。在一个时期内,内陆地区仍然需要以外资与外贸来体现开放度的提升,但在制造业出口上要更多注重现代高端产业和附加价值高的产业,在贸易方式上要体现在一般贸易发展相对更高的速度,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的延长和增加值的提升。进口既是中国市场优势的体现,也是内陆地区在开放中发展的路径之一,内陆以进口而不是单纯以出口体现开放,是与以往东部沿海地区开放的一个重要区别。沿边地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要注重具体合作项目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外资外贸,以此来体现其经济与政治辐射的影响。

第五,对外开放战略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国际总战略中的一个方面,要服务服从于国际总战略,为总战略的需要定位。区域战略的选择同样要贯彻这一原则。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走在全国的前列,现代服务业和金融业的开放要成为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交换的一个重要举措,事实上这也是中国自身结构进步和开放领域扩大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已经向国内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更高效透明的政府行为,更安全规范的

法律制度,是全球化对中国的新要求,也是改革的新课题。以开放促改革是国家战略,需要在沿海先开放地区先行先试。制度优化将成为沿海地区开放战略的最大主题,这将对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际战略的推进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内陆地区的市场战略同样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沿海地区体现水平的同时,内陆地区要体现规模与实力,沿边地区要体现策略与多样化,共同构建中国开放的整体部署。大西南是中国沿边地区开放的一个重点,其与东盟地区的合作既将改变东南沿海地区的开放格局,深化中国东盟合作这一国家战略,又将对内陆地区产生积极影响。

张幼文 徐明棋

2013年9月

序 言

根据系统动力学原理,一个大系统可划分为若干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网络,研究应立足于整体以及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以整体观替代元素观。

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是由多个子系统所构成的。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互动是开放国策大系统运行的基础。

在对外开放的各个子系统中,贸易、投资与金融,即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与金融开放是最重要的三个子系统。研究这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互动效应是认识开放大系统的基础,研究三者之间的互动规律是制定开放战略的前提,而从三者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上探索开放的推进方式则是探索开放升级的新思路。今天,在我们注重战略层面顶层设计之时,这一研究思路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

贸易与投资的互动与协同在于投资创造贸易,贸易推进投资。回顾对外开放30多年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出口能力的提升主要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在中国严重缺乏国际市场开拓能力的时候,外资对中国出口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加工贸易出口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方式,而其基础同样是外商直接投资。国际直接投资把中国纳入国际价值链分工体系,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的主要特征和重要基础。贸易的发展是中国高速增长的动力之一,而这种高速增长正是外资流入的主要引力之一。出口的提升又为国内产业配套能力提出了需求,为外商投资打开了日益广阔的空间。开放战略升级的核心在于,投资创造贸易需要升级,而贸易推进投资需要转型。中国需要吸收更高层次的外商投资,包括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以高水平的外资构建高水平的出口,改变现行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中国需要从单向引进外资向同时注重对外投资升级,以投资跨越贸易障碍,获得扩大贸易的资源供给。贸易推进投资的转型在于,要以贸易发展形成的经济基础推进国内的投资与对外投资。中国的出口能力不应当长期依赖于外商投资去发展,前期积累的资金与投资能力应当成为未来出口能力构建的有利条件。更重要的是,由前30多年出口发展积累起来的巨大外汇储备已经形成了中国巨大的对外投资并购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中国跨越一些国家

的贸易壁垒,通过对外投资开辟市场和获得资源供给的强大基础。

贸易与金融的互动与协同在于贸易产生金融,金融提升贸易。作为贸易大国,巨大的物流导致了巨大的资金流,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贸易发展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开放型金融体系建设的核心是利用贸易大发展的有利条件。融资对于贸易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但中国今天所面临的局面却并非简单意义上的贸易融资问题,而是一个开放型金融体制建设与贸易大国地位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出口发展依赖于外商投资的历程表明,中国缺乏有效的国内融资机制以有力支撑外贸发展。中国需要实现金融深化,以有效的资源配置形成产业竞争力来支撑贸易发展。同时,中国需要在开放中建设一个更高效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产业竞争力与出口能力。可见,以开放型金融体系的发展促进贸易发展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其意义远远超过了企业微观意义上的贸易融资。

投资与金融的互动与协同在于投资培育金融,金融支撑投资。制造业外资的引进是中国开放的起点,外商投资的发展逐步从制造业扩展到金融等现代服务业,而金融领域的开放至今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外资引进从制造业向现代服务业扩展,特别是向金融服务业扩展是开放战略的当前主题。然而,金融的开放并非只是因发达国家要求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而在于中国自身需要建立起一个开放型的、高效的金融体系。过去中国缺乏资金,需要外资流入。然而今天中国已经并不缺乏资金,国内大量资金的存在却不能有效形成投资。其关键在于投融资体制的落后。开放金融是建设有效的投融资体制的关键,这不仅将吸引金融服务业外资的流入,而且会因此改变中国过度依靠外资流入的格局。融资体制优化下国内外资本竞争性投资的格局将带来中国经济的新局面。

上述三大领域对外开放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分析表明,当前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不应当只是单个领域战略的自身推进,而应当是三个领域在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中整体推进。只有这样的推进,才有可能实现对外开放的整体升级。

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的原理同样也启示我们思考更广义上的对外开放顶层设计。

首先,开放与改革的互动与协同。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崛起的根本,其从一开始起就是一个互动的战略部署和协同的政策推进。特区的改革决定了外资的流

入,外资的流入冲击了国内的体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成了国内的改革动力与红利,为入世承诺进行的国内改革带来了新世纪中国在开放中的高速发展。今天中国再一次地处于构建改革与开放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的关键历史时刻:与美国等国家双边投资协定(BIT)的谈判,成功回应跨太平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TPP),对外经济的这两个重大问题大量涉及的不是入世时的关税减让,而是国内体制,特别是有代表性的行政审批制。改革再一次面临开放的倒逼形势。一旦形成科学的顶层设计,以改革的推进迎接全球化的新挑战,中国就可能获得新的开放红利与改革红利,构筑新一轮发展的新机制,而这一轮发展将在中国走向全面小康和中等发达经济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其次,沿海与内陆的互动与协同。开放从沿海地区开始,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一战略选择。中国前30多年发展的出口导向战略也决定了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开放度的差异。地理和产业历史发展等基础性因素,开放政策选择等战略性因素,二者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开放格局的地区差异。然而,一个全面发展的开放型经济需要改变这一格局,国家消除发展不平衡的历史任务也需要改变这一格局,内陆地区同样需要和可能利用开放形成发展的动力。沿海与内陆地区在开放中的并进将是一个新的互动与协同格局。沿海地区将传统产业向内陆转移,腾出空间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沿海的外向型经济体系形成更长的国内产业链拉动内陆经济,内陆的市场潜力与规模优势构建中国更高水平的开放优势;等等。这些将形成中国沿海与内陆的互动格局,通过政策协同把整个经济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沿海内陆开放的同时,沿边地区也需要构建各具特色的开放模式,特别是与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模式,而不是采用与沿海相同的开放模式。各地区不同模式的差异发展相互配合将形成中国新的开放阶段上的特色。

再次,引进与创新的互动与协同。引进外资是中国前30多年开放的基本特点的发展核心,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上具有不可否定的意义,也将长期坚持。然而,价值链分工低端地位已经深刻地提醒了国人当前开放模式的相对不利性。自主创新是未来发展的核心,也是改变国际分工地位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开放与外资引进的结束。两者的互动与协同成为一个新的课题。以引进促进创新,以创新应对竞争,引进外资与自主创新两者的互动与协同将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新的模式,这正是一个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的运行模式。以科学的体制机制设计处

理其中的矛盾,如人才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的压力等,是新阶段上开放的主题。

最后,出口与进口的互动与协同。尽管中国的发展从外贸发展开始,但实质上外贸更侧重于出口而非进出口的平衡发展。长期以来中国一般贸易逆差,全部顺差来自于加工贸易,表明中国自身产业发展缺乏竞争力,整体出口能力有限。提升出口能力是新阶段发展的主题。然而更重要的主题在于进口的发展。世界经济不平衡以及当前的危机都向中国提出了一个新的主题:扩大内需,扩大进口。然而如何使进口更好地发挥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新课题。中国需要在四个意义上发挥进口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一是装备奠基作用,即通过引进关键装备为发展起一批新兴产业创造必要的基础条件。二是产业补缺作用,即通过引进一部分国内一时缺乏的关键零部件以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产品创新,从而实现产业进步。三是竞争激励作用,即通过适度的市场开放进口形成与国内的竞争关系,使国内企业在竞争中更有效率地发展。四是消费培育作用,即通过进口最新产品创造和培育国内消费市场,进而利用中国市场规模大的最大优势为国内这一产品的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可以相信,这些进口作用一旦发挥,将与已经形成的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形成互动并协同,使中国经济在一个更高水平上运行。

由赵蓓文研究员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本所各研究室的多位青年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了本书的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开拓了开放中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的新思路,既揭示了开放型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又以互动与协同原理进行了开放型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不仅构想了贸易、投资与金融等领域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问题,又启示了未来开放型经济新发展的规律探索。作为智库型研究机构,我们期待身在对外开放第一线的各级政府决策者能从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并对我们的研究提出宝贵的意见与建议。我们期待与各地政府决策者的互动,以期在协同中为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张幼文

2013年7月22日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内容提要

本书围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国家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这一背景,从科学发展观对于新形势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内在要求出发,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三个重大问题:外资、外贸和金融;进而分析外资、外贸、金融开放之间的相互关系,认为在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这一项系统工程多个子系统中,贸易、投资与金融,即对外贸易、引进外资与金融开放是最重要的三个子系统。这三大子系统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是科学发展观在对外开放中的体现,必须以整体观替代元素观,研究三者之间的互动规律,并从三者的战略互动与政策协同上探索开放升级的新思路。在此基础上,本书从两个意义上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总体思路,即必须解决制度约束问题,必须解决市场效率问题,并指出,只有对内突破国内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和资源环境的约束,对外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整个研究主要包含三条线索:一是外资、外贸、金融本身如何突破体制机制、产业结构和资源约束,进一步提高开放效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理念如何在开放型经济体系发展中得到体现。二是外资、外贸、金融开放的互动;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来突破制度约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从内容来看,本书主要包括导论和五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为一篇,每篇就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各部分的主要内容和战略要点如下:

导论,“科学发展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指导思想”。本部分直接切入主题,指出新形势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三个重大问题:外资、外贸和金融。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总体思路和战略要点,分析需要重点突破的主要问题。研究指出,全面协调可持续在对外开放中的涵义实际上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外资、外贸、金融子系统本身的对外开放问题。二是外资、外贸、金融三大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互动问题。三是整个中国开放型经济体系与外部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

第一篇,“科学发展观视角下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理论探讨”,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本篇提出,国际经济学理论注重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对发展增长的作用;中

国及新兴经济体开放经济理论注重外部拉动外资外贸规模型发展;科学发展观在开放型经济中的体现就在于提出了效益型开放观,提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从粗放走向集约与低碳经济,对过去依据劳动力优势开放模式的收益与转型进行重新认识,对土地税收等激励型开放政策进行反思。

第二篇,“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建设经济强国的指标分析与评估”,包括第三章和第四章。本篇主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对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成果进行检验,设计两大类型指标:一类是收益型指标,主要用于衡量中国国民财富的增长水平,体现“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另一类是质量型指标,主要衡量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建设经济强国的内涵、目标,并就相关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估。

第三篇,“制度优化与‘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资战略的调整”,包括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本篇主要研究中国的制度优势是什么,优化的重点是什么。从开放型经济而言现在制度中的问题特别是各地区外资外贸 GDP 数量追求下的负面问题,如何从制度上设计有利于发展竞争,避免恶性竞争和指标导向是关键。从“后危机时代”看外资战略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升级的机遇。“后危机时代”是否有利于中国引进外资?在走出危机的各国产业政策上,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的动态是什么,我国引资战略的重点在哪里,应采用什么政策。

第四篇,“开放型经济的平衡发展与外贸新战略”,包括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本篇主要研究外贸战略的重点是如何提高加工贸易国内成分,如何提高一般贸易的出口竞争力,进口如何为国内结构升级和转型发展创新驱动战略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外贸战略必须覆盖两大平衡,一是国内市场拉动与外部市场拉动的平衡,二是进出口的平衡。扩大进口的目的是为了外贸的平衡,为了用好外汇资源和提升开放型效益。因此,要处理好进口贸易与扩大内需之间的关系,实施从单向贸易向双向贸易转变的外贸新战略。

第五篇,“发展开放型金融体系提升外资质量”,包括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本篇重点阐明提高金融体系的融资效率与外资、外贸的关系;金融开放与提高金融体系融资效率的关系。金融业、制造型服务业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完善如何服务于外资、外贸。研究人民币国际化与中国开放型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关系,从有利于贸易投资水平的提升提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安排。从